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张崑将 著

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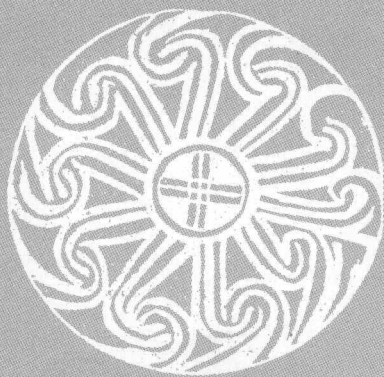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张崑将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
张崑将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717-8

I. 德… II. 张… III. 儒家-研究-日本-江戸时代 IV. B3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068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124 号

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

著 者 张崑将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任莉莉
责任校对 陆海明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a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17-8/B·363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黄俊傑 谨识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自序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研究日本史？”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常会想到梁启超的一句话：“取道日本，回到中国”，当然我们的时代课题与任公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因此虽然同样是“取道日本”，同样是“回到中国”，时代脉络和个人心境也大不同。先说“取道日本”，我选择日本思想史而且扣紧德川时代作为研究重心，我必须承认在国内的学术圈中，仍然欠缺对话的对象，因为海峡两岸学术界对日本史的研究，大多把焦点放在近现代的日本。这种趋势，乍见之下很像当年梁启超那一代人的“取道日本，回到中国”之态度，同样有着向日本的现代化之成就取经的意味。只不过现代研究日本的台湾学者对于回到“中国”已是愈来愈模糊了，在梁启超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是很鲜明的，他们也有深厚的传统学问根基。但在台湾受教育的人，不要说“中国”是抽象的，连“取道”有时都不知道为何而取。殊不知如果只是捷径式的“取道日本”，根本无法了解真正的日本精神，如果不能真正“取道”，当然也回不到“中国”。因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勱等人，都是取“近”道，而非取“远”路，“近”是指已经富国强兵的近代化日本，“远”是指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精神。日本近代化的富国强兵政策的确“成功”，但其后往军国主义发展所带给东亚民族以及自身的苦难则应属“失败”。而作为现代的研究者，我们所关怀的是：为何日本比较能走向近代化？又在她近代化成功后，最终为何会走上选择欧美帝国主义路线的发展方向？以日本的传统民族性而言，近代日本有无可能走上其他不一样的国家发展路线？未来的日本又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些问题都不能只是

从近代日本发展脉络中找寻,必然要回溯到日本的传统精神,深入探索、缜密研究,才能拨云见日,否则如果只专注近现代的日本,犹如哈日族般的速食追逐,终难深入理解日本。日本的近现代精神及其发展,一定有其传统渊源,如果不能了解日本传统精神的真谛,又何以能精准解释近现代的日本呢?

再说“回到中国”,当然这里的“中国”是指“文化中国”而言。事实上,近代以前“文化中国”或“文化中华”在东亚世界中是一个普遍价值的中心,这种文化心理状态不仅仅是就中国士大夫而言,还包括韩国与日本德川时代的儒者亦都如此。东亚知识分子认为,孔孟程朱陆王所坚持的儒家道德,皆具有普遍意义与实践价值,它是跨国界、跨民族而不局限于一国一家的道德价值,例如仁义礼智四端之心、程朱理学、孔子的仁学、孟子的性善论与王道精神等,主要的关怀都是普遍主义的精神。总之,儒学的普遍价值精神,对日本学者而言,常具有谜样般的吸引力,例如日本德川儒者藤原惺窝(1561-1619)闻孔子之道,不惜生命危险乘桴浮于海,为的就是想到中国亲聆圣教;伊藤仁斋(1627-1705)则视孔子为宇宙至极第一人,《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中江藤树(1608-1648)遵循阳明学心学精神,认为阳明是先觉出世。换言之,不论孔孟或是程朱、陆王,吸引日本学者的并不是政治的中国或地大物博的中国,而是文化精神的中国,所以儒学在日本被称为“儒教”,除了它有“教化”之意以外,还带有“宗教”企慕之情。因此,儒学在日本江户时代甚为发达,大量的武士阶级无不受受到儒学教化的影响,我们所了解的武士道精神除了有佛教、神道的渊源外,主要还有日本化的儒学精神。虽然儒学在近代中日韩的历史发展中,曾被视为近代改革的绊脚石,一度遭遇挫折,淹没于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等之洪流中,尤其经历了五四反传统、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地覆天翻般的破坏狂潮,却如刘禹锡的诗句所说“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依然持续在东亚社会中展现其健动精神。但值得令人检讨的是,破坏中国文化最甚的还是中国人本身,我举日本当年侵略中国为例,当日本军队经过圣人孔子的故乡山东时,他们逢乡必抢掠烧杀,却独独跳过曲阜;又凡日军行军到各地,由于怕遭游击偷袭,常以

当地孔庙为驻扎之营地，因为他们相信，不论中国或日本，都不敢在圣庙中进行凶残血腥之事。但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中国的孔庙几乎无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毁坏。我们不禁感叹：中国人破坏自己的文化远比外国人为甚！这就是我们必须“礼失求诸野”的原因。例如韩国的孔庙，还保留了古代的祭典礼仪；日本东京的汤岛，也还有祭拜孔子的圣堂。总之，在中国已经丢掉的，我们却可以在外国找了回来。而“回到中国”并不是要我们当传统文化的孝子，更应是一种批判性的继承。儒学的价值有许多的面向，言人人殊，历代学者虽俱折服孔子，但取舍不同，都自认为是真孔子之道，中国学者如此，韩国、日本学者亦如是。不管是韩国化的儒学，或是日本化的儒学，都具有各自的文化脉络的特色，我们不必坚持儒学仅有一种解释，反而应该承认儒学解释的多元现象，以及重视各个文化脉络化下的普遍价值，寻求一个多元互济、理一分殊的共同精神，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回到中国”的态度。本书从儒学核心的“忠”、“孝”道德，比较中日儒学的异同，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态度。

在学术的路上，我的阅历尚浅，本书能纳入《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出版，是我的殊荣，衷心感谢。值此出版之际，回顾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所的十年求学生涯，师长对我的教诲与提携、同学们给我的关怀和勉励，刻骨铭心，实非笔墨所能表达。尤其业师黄俊杰教授，当年就因为听他那一席精采绝伦的课堂讲授，让我大梦初醒，使我从不知学术为何物、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噩状态中，猛然惊觉学问和知识的浩瀚与高深；扭转我对历史学的认知，开拓我的视野，重拾我对知识追求的热爱。于是，黄师带领我从儒学的基础研究着手，建议我修许多相关思想史的课程，并时刻叮咛英日文学习的重要性，建立我日后研究德川儒学思想史的基础。黄师对于我的论文指导，更见提携之情深，我的文笔常见滞塞，我每篇出稿刊登之文章，黄师必亲自校阅批改，拿回的文稿每每是满江红，除改正许多文辞不通顺之处，对学生论点的批驳与意见更是鞭辟入里。我的硕士论文已是如此，博士论文更为费心，不惜一改再改，即使至今已谋有教职、为人师，仍然时刻不忘鞭策与指导。我能在日本思想的研究领域里有所体悟，都是拜黄师的引领。另外，我自硕士班

开始接触德川儒学思想的研究,博士班时代亦蒙业师黄俊杰的引荐,可以参加他所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的学术会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除了在会议中常可见到许多师长们的学术风范与精辟的论辩,最特别的是这个学术会议的性质,集结了国内优秀的文史哲专家学者,探讨有关经典诠释的学术真理,对于我来说,有如刘姥姥逛大观园一样,一时之间五彩缤纷,眼花缭乱。但诸多领域中却都牵涉到经典诠释的中心议题,而这个课题是普遍性的,因此虽然讨论内容涉及众多领域,却都可以互相对话交流,这不仅扩大了我的研究视野,也深深体会到跨学科、跨国界、跨时代交流对话的重要性。这本博士论文的写作期间,许多论点也都是在上述关怀的课题下所完成。

这本书能够问世,还必须特别感谢博士论文的口试委员们,像李永炽老师指出许多日本思想史脉络的问题以及章节编排的不当;杨儒宾老师质疑许多有关中国道家及阳明学思想的论点;李明辉老师提出一些专业哲学的用词之不当;刘述先老师提供一些西方学者对于日本儒学研究的许多重要资料;张宝三老师指出许多文句和论文结构之问题;林庆彰老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日本文献之参考资料等等。小至论文文句的错字、基本论文的格式,大至论点论证的漏洞、整体论文之结构的不当等,他们的指教都成为我修正论文的最佳参考意见。

走笔至此,回想本书的写作过程,大部分是在京都大学短期研究的期间所完成。但在此之前,我的硕士论文已经触及德川前期的古学派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思想的研究,为了能更清楚掌握德川儒学思想之整体思想脉络与发展特色,博士论文仍然选择反对朱子学的阳明学者与兵学者的思想作为研究重心。在京都留学近一年的日子,想到在京大教育研究室中,许多日本师长与研究生给我的帮助,尤其辻本雅史先生的厚爱,让我在京大不仅拥有研究室,也因而可以与当地的研究生有许多交流的机会,又可就近向他们请益问学,发我愚蒙,惠我良多。其次,神户的官城公子先生,如果不是她的推荐,我也没有机会到京大作短期研究,论文写作期间,两次往返京都与神户间,为了就是得到先生的指导,如今论文内容的一些概念与论点,皆是拜

先生之赐。又，研究阳明学的荻生茂博先生的许多文章都与我研究密切相关，能够在日本与台湾就近向他请教，改正了我论文许多瑕疵之处。学术之路，博厚而高明，漫漫而长远，若独学而无师友互相扶持，我也许至今尚不知学术为何物，终究只能是一种无法成长的矿物，而非是一株有机生长的植物。谚云：“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自认浅学非才，修行尚浅，面对师长们对学术真理的坚持，以及许多研究的成果，望能继踵前贤而有所寸进，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能完成这本专著，我还必须对背后支持我的家人奉上最大的敬意。我能在研究生阶段，就可以专心写我的论文，尤其在两个幼子相继出世后，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与鼓励，要完成论文恐怕是遥遥无期，特别是我的双亲，他们虽没进过小学受教，却能长期支持我对学问知识的追求，茹苦含辛地帮我照顾两个幼子；又，大哥以及二哥嫂们长年以来在我精神上与经济上的支持与鼓励，使我能无后顾之忧，专心从事我的学术研究。我长期无工作期间，内子能一路无怨无悔地跟着我，一面上班，一面又要照顾小孩，辛苦异常，她常对我说：“你真的很幸运，在求学的路程中，有这么多的人帮助你。”我非常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幸运，不论是师恩或是亲情，他们始终如一地支持我、呵护我，一切的一切永铭我心。

张崑将

2003年5月24日序于台北

目 录

自 序.....	1
一、绪论	1
一、研究课题	1
二、“忠”“孝”概念研究的三种偏向	9
三、研究进路与章节概要	14
(一)“忠”、“孝”思想的宗教泉源	14
(二)本书“思维的纯粹性”之概念	16
(三)本书的“自然观”概念	21
(四)本书章节概述	24
二、德川思想界的气论与自然观的流派	27
一、前言：丸山真男“自然观”之问题	27
二、中国儒道思想的自然观略论	31
(一)老庄与王充的自然观	33
(二)儒家的道德式自然观：从孟子到朱子与阳明	36
三、日本传统的自然观特征：神性与感性的自然	39
四、以气反理：德川儒者“自然观”中“气论”的多元与互通	46
(一)江户时代神道学说中的气学	47
(二)仁斋之气论——“不可知论”的自然	51

(三) 山鹿素行之气论——“不得已”的自然	55
(四) 阳明学者之气论——“无限太虚”的自然观	58
五、结论	66
 三、“孝”思维的典型：从阳明学者中江藤树到大盐中斋	70
一、前言	70
二、阳明学者的“太虚”与“孝”之本体性与宗教性	71
(一)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日思想家之争议	71
(二) 日本阳明学者“孝”的本体论思想：从《孝经启蒙》 到《增补孝经汇注》	75
(1) 中江藤树“孝”的中心思维	75
(2) “孝”与“太虚”思想	80
(3) 大盐中斋的“孝”本体论思想	83
三、自然观思维下的宗教意识	92
(一) 中国“圣人之道”与日本“神圣之道”	92
(二) 中江藤树的“上帝”与熊泽蕃山的“神道”	98
(三) 三轮执斋的“天神”、佐藤一斋的“灵光本体”、 山田方谷的“事神养气”	105
四、自然观思维下的“万物一体论”：以大盐中斋为中心“万物 备于我”与“我备于万物”	110
五、结论	117
 四、“忠”思维的典型：从兵学者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	120
一、前言	120
二、“武士道”精神对幕府政权之冲击	121
三、“忠”思维下的“神皇”意识：从《中朝事实》到《讲孟余话》	128
(一) 《中朝事实》中的日本主体性	128
(二) 《孟子》义理与日本主体性的冲突焦点	

——吉田松阴的孟子解释	132
四、自然观下的“忠”思维模式	138
五、结论：兼论天皇制与国家主义	146
五、“忠”“孝”思维的冲突与合一	150
一、前言	150
二、古代日本“忠”“孝”思想之特色	151
（一）古代神话中的“孝”思想及其发展	152
（二）古代神话中的“忠”思想及其发展	156
三、日本德川社会是否“忠”优于“孝”？	160
四、阳明学者之“孝”与兵学者之“忠”思维的冲突焦点	166
（一）“孝”“忠”思维的冲突	166
（1）阳明学者的“忠孝”思维：“忠”本“孝”之一端	166
（2）兵学者的“忠孝”思维：“孝”附于“忠”	170
（二）“士”的责任感之冲突	174
（1）中日“士”论之比较：“士大夫阶层”与“武士阶级”	174
（2）“道德理想型”责任感之士与“政治实用型”责任感之士	178
五、“忠”“孝”概念的同质点与“忠孝一体”论	185
（一）忠孝超越原理的同质点	186
（二）“忠孝一体”的一元性结构理论：后期水户学与吉田松阴	189
六、结论	198
六、大盐中斋与吉田松阴的“知行合一”之行动论精神	201
一、前言	201
二、幕末的时代与精神：兵学与阳明学昂扬的时代	202
三、幕末维新“知行合一”实践精神的代表者：大盐中斋、吉田松阴、 西乡隆盛	206
（一）“知行合一”精神与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在近代	

日本之形象与评价	206
(二) “知行合一”思想内涵的认知差异	213
(1) 阳明的知行合一概念	213
(2) 中国儒者“仁本论”意义下的“心”:道德本体论	216
(3) 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的“孝本论”、“忠本论”意义下的“心”: 道德实践论	219
四、中日生死观之比较	224
(一) 中国“仁本论”意义下的“杀身成仁”观	226
(二) 大盐中斋“孝本论”意义下的“一死生”与“归乎太虚”精神	228
(三) 吉田松阴“忠本论”意义下的“狂”与“报国献身”论	233
五、结论:兼论吉田松阴的思想特质	236
 七、结论	240
一、引言	240
二、道德性实践、政治性实证、宗教性实在的实学	241
(一) 具有“孝”德精神的“道德性实践的实学”	245
(二) 具有“忠”德精神的“政治性实证的实学”	246
(三) 具有神道思维的“宗教性实在的实学”	246
三、日本德川儒学思想研究的展望	250
(一) 关于儒学经典诠释研究的展望	250
(二) 关于阳明学研究的展望	253
(三) 关于兵学者研究的展望	257
 附 录	261
附录一:日本阳明学者系统简表	262
附录二:日本兵学者系统表(山鹿流略表)	264
附录三:日本德川时代《孝经》著作一览简介	265

附录四：王阳明前后之明代著作《孝经》比较表	281
附录五：清代《孝经》著作统计表	285
参考书目	288
名词索引	307
人名索引	314

一、绪 论

一、研究课题

本书论述的主题是德川时代(1600-1868)日本思想史中“忠”与“孝”两个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但是,我们首先要问:何以日本思想史中的“忠”、“孝”概念值得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教育敕语》说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从1890(明治23)年颁布《教育敕语》以后,推动国家发展方向的核心就是运用儒教道德的“忠”、“孝”伦理^①,井上哲次郎(1855-1944)、加藤弘之(1836-1916)等人并演绎为“家族国家”观,将“忠”、“孝”推尊到先验式的道德观^②。令人好奇的是,《教育敕语》颁布之前的《教育圣旨》、《教育附议》都还见有“仁义忠孝”相提并论^③,足见在《教育敕语》颁布以前,当权者

① 该《教育敕语》的内容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亦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矣。”(原日文)井上毅:《教育敕语》,收入《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之《教育の体系》(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383页。由于本书常引用日本原典文献,因此有必要在引用的体例上加以说明:日本原典文献有汉文与日文之分,因此只要在引文后面加上“原日文”三字,均表示笔者所翻译,其他不标示者,均表示该原典为汉文。

② 关于井上哲次郎与加藤弘之二氏所推展“家族”=“国家”的观念,李永炽先生在《明治日本“家族国家”观的形成》(收入氏著《日本近代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年)一文中分析很详细,可资参照。

③ 《教学圣旨》说:“教学之要,在明仁义忠孝,究智识才艺,以尽人道。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以为上下一般之所教也。”(原日文)收入《教育の体系》,78页。明治天皇的儒学侍讲官元田永孚(1818-1891)的《教育议附议》也说:“是圣旨之本义,其要在明仁义忠孝而已。”(原日文)收入《教育の体系》,84页。

与知识分子不仅讲“忠孝”还兼论“仁义”，为什么到最后日本教育政策由进“忠孝”转而退“仁义”呢？日本德川时代的儒者，对“忠”、“孝”内涵的思考，到底与《教育敕语》的“克忠克孝”有哪些异同？二者之间有无思想的继承关系？再者，中日两国的儒者所思考的“忠”、“孝”观有些什么关联和差异？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但却是了解日本从近世到近代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但是，有关日本川时代“忠”、“孝”思想课题之研究，许多专书中虽偶尔有稍加涉猎，却都没有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我在京都大学研修的期间，发现竟连二手的相关研究论文也很少见，许多研究均从日本封建特殊的“家”结构切入，才又顺便提到忠孝的思想。因此，对于日本德川思想史中“忠”“孝”的思维内容，许多研究者都仅流于印象式的了解，未见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我在阅读日本阳明学著作时，发现日本阳明学者多将“孝”当作宗教意识，并常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思想有关联。除此之外，一些知名的阳明学者把宋儒的“仁体孝用”逆转为“孝体仁用”，“孝”不仅上贯天道还下贯人道，具有形上论的地位。我在翻阅日本《国书总目录》时，意外发现德川时代有关《孝经》的论著，多于明清两代有关《孝经》论著之总数。（参本书最后附录三、四、五之比较表）这个现象颇让我疑惑：许多学者印象中的德川时代社会，不是“忠德优先”之社会吗？为何有关“孝”的阐释会这么蓬勃，为解决这个疑团，须深入去比较德川时代儒者的“忠”“孝”观，而德川时代强调“忠”思维的学派中，以勤皇的兵学家为最，同时兵学家也是以“宗教性”来思考“忠”的道德，所以兵学家也纳入了我的研究范围。

既然阳明学者着重“孝”，兵学者强调“忠”，都具有宗教意识，而他们所依托的宗教意识的精神根源何在？我在阅读相良亨与尾藤正英所编的《讲座日本思想》第一卷的《自然》一书时，许多学者讨论日本人的传统“自然”思想时，都指出“自然”与宗教有莫大的关联。例如日本净土宗的开祖亲鸾（1173－1262），他的“自然法尔”法号就是阿弥陀佛信仰，国学派的本居宣长（1730－1801）在思想尚未成熟时已经倡导“自然的神道”。其实不只是国学